

作协十楼

□范小青

“作协十楼”,是一个简称,更是一种感情,是我们这些常到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开会的人心领神会的一种感情。

最早的时候,中国作协在哪里办公,后来又到了哪里,65年的时间里,搬过几次家,经历过哪些折腾,等等这些,我都不太清楚,也没有想到去查询搜索,因为我觉得她在哪里办公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她一直在我们心里。

在我的记忆中,就有沙滩北街和东土城路。沙滩北街那一处我也曾去过,只是因为年代有些久远了,至今已经忘记了那时的情形,却在我当年的文章中还能还原,比如我这样写过:“有一次我到北京找沙滩北街中国作协,一位三轮车老师傅拖着车我找了半天……”瞬间就让我回忆起往事了,所以会感叹有文章真好,有文字真好。

之后就到了现在所在的东土城路25号,作协是哪一年搬到东土城路的,我同样不太清楚,但此后的记忆却渐渐地多了起来。曾经在9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我在那里住了近两个月,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研修班,不知为什么没有住在鲁院,却住到了作协二楼的招待所,每天上课,每天到食堂吃饭,人到中年,又重新适应了一段时间的集体生活,感受着中国作协大楼里那种平凡朴素而又充满温情的气氛。

再后来,尤其是近些年,再到中国作协去,几乎就是直达十楼了。

十楼是中国作协的一个较大的会议室,在这个会议室,除了中国作协各部门的会议之外,最多的大概就是为全国各地的作家召开作品研讨会了。

在我到江苏省作协工作的这几个年头里,我偏好多次踏进作协十楼的会议室,参加由中国作协为我们江苏作家主办的作品研讨活动,也曾经有好多作家和我探讨过,那个十楼的门槛不高,有多高,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跨进那个门槛去。

我说不清,但我知道,门槛的高低,自在人心。

就我所参加过的我们江苏作家在“作协十楼”的研讨会,其中有早已享誉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崭露头角的新人新作,还有很多最基层的作家,他们多是生活和工作在市、县甚至乡镇的作家,所以我想,这里的所谓门槛,其实就是作家对于文学、对于写作的热爱和坚守。如果有门槛,那么凭着你的热爱和坚守一定能够跨进门槛,如果那地方没有门槛,那么一定有另一道门槛横在你内心深处,那是你自己为自己所设的门槛,那仍然是你对文学的热爱和坚守。

也许有人会对其研讨活动的作用和真实的意义产生不同看法或质疑,但是对于一位基层的作家来说,能够到中国作协的会议室召开自己的作品研讨会,这必定是他

人生经历的一个新起点,是他写作生涯的一次大推动。我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我还年轻,正在上大学,还没敢开始做文学梦,陆文夫老师邀请了一批文坛大家来到我们学校,在大礼堂给我们讲文学,那一个场景,至今留在我的记忆深处,至今让我热血沸腾。

所以,我想,“作协十楼”,本身就是一种热爱,就是一种坚守,它就是为了鼓励和支持基层作家而立的。

基层作家是什么?那就是文学金字塔的塔基,塔基越大,越坚实,塔尖才能越高,越灿烂,“作协十楼”这四个字,向我们传递出的,就是这个意思。

会议结束,我们通常会穿过马路到对面的饭店吃饭。无论中国作协的领导和负责会务的同志有多忙,都会陪着基层来的同志到那里吃个便饭,一来二往,这家饭店似乎也已成为我们的老朋友。它很普通,没有豪华的装饰,没有高档的包厢,我们也从来没有吃过什么高档的菜肴,但它却是我们在北京最轻松最随意的一个去处。

在饭店的斜对面,就是香樟园宾馆了。每次到作协十楼参加江苏作家的研讨会,多半是到香樟园宾馆住宿,出租车司机知道这个宾馆的并不多,但对和平里、对东土城路都是熟悉的,一路上不会费什么周折,最多到了砖角楼那地方小转一下,就到了。

这个宾馆没有“星”,却能够让人安心,它踏实,小而简朴,而且离作协很近,步行也只需几分钟就到。便捷,实在,一如作协为基层作家召开的每一次研讨会的风格。

我们的人生中也许偶尔会有机会住一住有着好几颗星的那种高档宾馆,有时候进入房间,看到的全是耀眼的玻璃,甚至能看到好几个自己,顿时感觉云里雾里,到处要小心翼翼,怕撞碎了脑袋,怕在滴溜溜的地上跌倒,在香樟园宾馆不大的房间里,你不用费心,不用操心,心是能够安放下来的,你就是你自己。

香樟园宾馆的早餐令人记忆深刻,不在于它的丰富精彩,而在于它的简单,我暗自称之为“二管”:一是管饱,二是管营养。这就足够,难道不够吗?一如作协对基层作家的支持一样管用。

吃过早餐,我们就出发了。

有时候是冬天,我们从香樟园宾馆走到作协,路上有点冷,进了作协十楼的会议室,热气就腾起来了;或者是夏天,那就是在酷热中,有一片清冷扑面而来。这种温度,就是中国作协一直以来给予基层作家的温度,我们一直以来都感受着,感动着,没有中断过,没有改变过,没有忽冷忽热,永远就是那样,温和而又朴实。

65年,始终坚定着一个方向,始终贯穿着一个宗旨:为作家服务,尤其是要雪中送炭。

65年,足以让一个人老去,却也可以让一个组织更年轻更热情。

作协十楼,是永存于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动。

作协的大门,永远向我们敞开着,无论大腕或是草根,无论你是成功或者正在努力甚至一辈子都不怎么成功,这扇门都是畅通无阻的,是有温度的。

这种温度,能够从东土城路那个点上,传递出去,传递到很远很远,传递到最远最远。

初,涌现了两位功昭三晋、荫披后世的著名教育家——山西大学和山西农大的创始人。一位是光绪十六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朝廷特命留英学者、山西大学堂总监督、中学专斋总理、民国山西省第一任民政长的谷如墀先生(清代张瑞玠《赠谷美塘》诗赞曰:“先生名望如斗山,先生一出群情安;舌底莲花翻海起,胸中云梦接天宽”)。另一位是留日先贤、中国农牧专家、创立西北农牧学科的鼻祖李秉权先生。令人遗憾的是,在山西大学百年校庆时,很多人却遗忘了山西大学真正的首创人谷如墀先生。

由此,我突发狂想,近百年来,三晋大地最有文化的人难道不是神池人吗?当代佛学大师、世界十大名僧、全国政协委员、五台山大主持、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清佛是神池人士。他自幼在宁武延庆寺出家,后浪迹萍踪,佛踪遍及大江南北,而后又高居五台山之巅修行侍佛,颇为众僧和佛学界之尊崇。论政要,古有翰林大学士、辽金两朝宰相虞仲文,后有冯爰立、孙吴、李孙蒙、谷如墀等贤仁达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挚友、同盟会先驱、光绪留日先贤谷思慎先生。谷思慎曾留学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政法系,与光复会等革命组织骨干分子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结为同盟,并拥孙中山为同盟会盟主,被孙委为同盟会华北盟主,后任“中国革命同盟会”经理部负责人,山西分会总干事,主管山西事务。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神池千余热血儿郎血洒疆场,数百精英南下西进,为打击日寇和蒋军、开创中华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涌现出了李启民、官福书、张维民等大批卓有成就的党政军高级人才,其功其绩,世代相传。论药业,三晋名医出神池,仅王氏名医便可称道。王雅轩先生,承袭六代祖传医术,悉心研究中医药学,曾深得阎伯川先生青睐,盛名享誉三晋。胞弟王沛藻承传祖业,精研医术,行医不分贫富贵贱,深受患者信赖和尊崇。特别需要赞誉的是孙家湾村王秉岐先生,开创桂龙药业,发明研制了“桂龙咳喘宁”、“慢咽舒宁”等数个品种的特效中成药,并于厦门创建桂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全国著名的药学家。论文艺,神池道情始于道律,盛于唐官,后传于民间,其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优雅的音乐特色,世世代代为民众所喜闻乐见,为中国戏曲百花园中一朵古老而绚丽的艺术奇葩。

神池的饮食文化也享誉三晋,神池月饼、麻花、胡麻油都是品牌,让晋人刮目相看。“神池长祥圆月饼”名贯省内外,并特供于南海,其制作技艺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神池人,有着独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形成了当值称道的神池文化,其魅力和神韵,代代传承,影响甚广。

我倏然惊喜地发现,深深挚爱着的故乡,竟是一座巍巍耸立在晋西北黄土塬上的巨大的丰碑。

远离故乡,思恋着故乡。在怀念中认真审视,审视中感情在升华。

阎罢县政协牵头编撰的《神池儿女》一书,勾起了许多我想说的话。这本书的编撰,确实是一件好事情,它对于进一步挖掘神池内蕴,了解神池文化,宣传神池人物,提升神池品位,塑造神池形象,弘扬神池精神,必将起到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

小雨淅沥,像思乡的情绪,细微绵长,且悠远而执着。我就这么独坐窗前,与故乡倾诉着,让心灵激动着。我走近神奇的家乡,感觉着她的神韵,领略着她的神采,梳理着她的神情,触摸着她的神武,我也不觉神气了起来。

见证与步履

庆祝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六十五周年

接到编辑约稿,我就一下想到了这个题目。回顾往昔岁月,我们作协的事业,是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同步前进的,是温暖人心的事业。在近现代,和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样,中国各民族作家们面对现实,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忘我创作,反映时代风云,书写人民的愿望,用文学的力量唤醒民众,为新中国的成立奉献了自己的才智,有的作家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作协担负起了组织各族作家的任务,代表党和政府为作家服务,在建设国家,繁荣创作,用积极先进的作品鼓舞人心、温暖人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给各民族人民奉献了希望和奋斗带来的精神食粮。改革开放以后,作协的工作进入了全面的发展时期,在每一个关键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抓住机会,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对内,满腔热情地抓会员创作,制定计划,为会员们创造条件,提供服务,既抓重点作家的创作,又培养新会员,保护作家的权益不受侵犯,发现新苗子,大力支持一线作家的创作实践,引领时代风尚,设立奖项,积极地为边疆少数民族作家服务,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设立创作扶持资金,开创了作协工作的新局面,为国家的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作出了贡献;对外,与许多国家的作协交流,广交朋友,得道多助,和优秀的作家交朋友,用拿来主义的态度,传播先进的写作方法,在文学创作的阵营中,中国作家与世界各个国家的作家们同步前进,把我们国家的文学成就也奉献给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们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我们新疆作家协会,是得到中国作家协会帮助最多的单位,我们感触颇多。可以说,多年以来,这种帮助是多方面的、具体的、感人的,指导工作、支持工作,为我们呼吁,帮助我们解决困难,鼓励各族作家创作,通过上海作家协会、湖南作家协会的力量办培训班,帮助我们少数民族作家提高写作水平,特别是在鲁迅文学院为我们举办高级研讨班、文学翻译班,帮助我们民族作家的作品走向全国,扎扎实实地、真心真意地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其结果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翻译家,推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为新疆多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进步,做了许多工作,在各族作家的心里留下了一份份感动。

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加大对边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支持和扶持,对一些有成就的、有发展前途的作家的作品,在创作及出版方面给与了具体的资助,作家们很高兴,感觉到了来自国家的帮助,内心很光荣。同时,这些项目又积极地促进了创作,提高了青年作家的创作热情和自豪感,是非常得人心的举措。

我的一个感受是,中国作家协会是我们各族作家真正的家。2000年,中国作家协会组团出访北欧,团长是王蒙先生,我有幸是团员,非常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出访欧洲。

温暖人心的六十五个春秋

□阿拉提·阿斯木

2006年,在新疆作家协会的安排下,我来到北戴河休假,更加感受到了作协的温暖。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一边休息,一边写作,思考人生,思考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结合点,与来自各省的作家们座谈交流,收获很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班里只有我一人是少数民族,食堂给我另开一席清真灶,饭菜丰富,酒水充足,也有了一次生活上的享受。

2009年,我有幸到鲁迅文学院去学习,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我们56个民族的学员欢聚一堂,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刘云山同志亲切接见我们,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作协领导和鲁院领导亲自过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和生活安排,关怀备至。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老师们的关心帮助下,我们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那段时间,听课-研讨,读书-讨论,与各地作家们交流,每天都生活在一个纯粹的文学氛围里。学校为我们请的都是一流的教授,在文学课程之外,还有心理学等多领域的专家讲座,彻底打开了我们的思路,把文学和生活摆在了我们面前,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示。特别是在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我有了新的独特认识,看清了我自己的写作。具体来说,对什么是小说、怎样写小说、写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写,有了全新的认识,受益匪浅,恨自己来鲁院学习太晚了。我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员,但我的心年轻了,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一直到现在,我的心还在鲁院,在那个亲切的小院,在温馨的305房间。白描副院长亲切和蔼的笑脸、施战军副院长精彩的点评、郭艳老师严谨执著的眼光、温华老师认真的神态,都留在了我感恩的心里。

作协从小到大茁壮成长65个春秋,也是我们的新中国文学从小到大、服务人民、在世界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65个春秋,是我们出人才、出作品,在文学殿堂里留下了辉煌的65个春秋,是有所作为的、团结作家们一起前行的65个春秋。我们知道,作家的事业是温暖人心的事业,这是我们的幸福和荣誉所在。

土地与生长

故乡的深度

□郭新民

窗外有雨,浙浙沥沥。这是一个夏日的夜晚。我长久地独坐在书桌前,听着雨声,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故乡——我牵肠挂肚的故乡、刻骨铭心的故乡、梦魂萦绕的故乡,我深深祝福和祈祷着的故乡,竟然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我走来。我倏然回到了故乡的怀抱。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此时的我却是:“侧耳听夜雨,疑为故园语。”故乡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神池。

相传上古神女,无婚而生双龙,龙子腾空而去,龙母亦隐其身,但见其羊水汤汤,遂于县城西流汇而成西海子,此为神池由来一说也。亦有传说,西海子是七仙女下凡洗澡的地方。其名之芳美,均与神池相关,这都是百姓向往美好的一种寄托。但神池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与那个美名差距之大令人甚叹!我非常敬佩我的祖先们能坚强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且生生不息、延绵不绝地创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间奇迹。

在我的“宁静斋”中,我悄悄审视着我熟悉和不熟悉的乡人——神池人,他们一下子便从故乡的深处走到了我的面前。

神池古属北狄之国,烦琐故地,当属边塞胡汉杂交之域,自古胡服骑射,战乱不绝,烽烟频仍,归属无定,至清雍正三年始建神池县。县龄不长,却颇有高度,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丘陵地区,平均海拔1509米,拥有三晋大地上站得最高的县城,海拔1560米,比东岳泰山还高28米。可惜众多神池人身居其境,不知其高,倒是神池的恶劣气候名声在外令人不寒而栗。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东征挺进山西,有支部队近百人在神池虎北过境,忽遇暴风雪,竟冻死十数人,成为历史上一个沉痛的经验!神池隆冬常有暴风雪,气温有时低至零下35度,过去冻死人的事情常有发生。儿时,我,戴狐皮帽、穿狗皮袜子,手和毡靴都冻红了耳朵和双脚,留下终身之疾。神池高寒少雨,十年九旱,老百姓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沙尘暴更是常见,有时“飞沙走石”,刮得昏天黑地,白天还得点灯。女人们出门,围着头巾,还得戴顶帽子,再漂亮的女人也防不住脸上留有被风沙强烈“亲吻”的斑痕,世世代代的神池人就是这么生活着奋斗着。我曾感叹“晋北生大风,芦芽长劲松。紫塞传新歌,神池养精忠。”在人们平常的印象里,神池人往往是淳朴老实正直刚毅的象征,为朋友能够两肋插刀,讲义气不分贫贱富贵,重情重义常常忍辱负重,修德性总是坦诚憨厚。神池的山山水水,养育了神池人谁能可贵的秉性和风骨,当然也造就了由神池人所建村的特有的文化和风俗。论饮食,猛而有量,煮酒言情,为三晋之最;论饮食,炖猪熬羊,油炸糕蒸莜面,丰而有精,佳而有味,颇具晋北美食风味;论生活,躬耕劳作,广种薄收,艰辛负重,顽强拼搏,生生不息,无怨无悔;论教育,史载明,清两代境内文武进士者6人,中举者32人,贡生百余人。其中出任户部主事、国子监典籍、翰林院待诏、布政司、知州、知县、总兵、副将、参将、守备、千总等文武之官者数不胜数。特别是清末民



■我之见

太阳的平凡史诗

□吴光辉

一片六十多年前的灰暗云块从洪泽湖上飘来,遮掩住荒凉寥落的涟水城上空,阳光立马变得暗淡无光,天气也变得阴冷起来。城外那马一望无际的蓄黄色的田野,便寂寞地等待着那场影响深远的国共对决在这里隆重开幕。这便是吴强在《红日》的开篇对苏北乡村景色所谓“自然主义”的描写了,他开门见山地交待将太阳描写得平凡而普通,甚至还带有明显的无奈和忧伤。

我觉得这里所有的场景全都被吴强写进了平凡,又全都是为了将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写平凡。吴强在《红日》的开篇给我们展现着这样的一种平凡景致:开始枯黄的树林,惊惶地叫着飞来飞去的鸟鹊,大群大群地从这个村庄、这个树林,忽然飞到那个村庄、那个树林里去,然后又飞往更远的村庄、更远的树林里去的苏北特有植被,废黄河堤岸的大道边那棵生去了240年的高大的巨伞般的老白果树,深秋初冬时节已经收割完的高粱、玉米、黄豆,像是一条条长辫子拖延在田里的山芋藤子,农场上寂寞地蹲伏着的一堆堆高粱秆、豆秸……吴强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渲染着日常生活的平凡。

这与现在的影视作品《红日》以粟裕将军和张灵甫的大战作为主线完全不同,吴强在对国民党军队整编74师攻占涟水、我军在孟良崮反攻的战争叙述中,偏偏没有正面描写这两位常胜将军,而是用大量的笔墨去描绘在这场国共两军大决战中的普通战士和普通群众。

吴强让历史的镜头聚焦在杨军的身上,尽管他只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他在这场战斗中,中弹倒在了涟水城里的一座矮墙边。吴强让他平凡凡地瘫软下来,普普通通地昏倒在了矮墙底下。这时,滚烫的枪压在他的身上。他的脸色已经苍白,呼吸也显得微弱起来,他缓缓地呻吟着,嘴里非常干涩,口唇不住地颤动,在强

烈的阳光下面,他闭上眼睛躺在地上。大约过了不到一分钟,一股硝烟窜入到他的鼻腔里,英雄的战士就这样无奈地倒下去了。

整个《红日》着力于对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中普通战士普通群众的描写,而一直到打败了74师也没有正面去写这场战役的真正指挥官粟裕,是刻意的回避,表现出吴强对这场战争的思考,突出了他将历史还原成平凡、将太阳描写成平凡的一种历史观。

当然,《红日》肯定不想否定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小说里更想突出表现的是普通战士和普通群众,这是吴强对历史的一种客观理解,这与当今拍摄的电视剧《红日》完全不同,而解放初期拍摄的黑白电影《红日》就更接近原著,表现出抒情、平凡、乡土的艺术特色。恐怕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不会忘记那首主题歌:“一座青山紧相连,一朵白云绕山间,一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谁不说俺家乡好,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弯弯的河水流不尽,高高的松柏万年青,解放军是咱亲骨肉,鱼水难分一家人……”这首歌曲极其抒情的旋律,唱出了沂蒙山区的美丽风光,唱出了军民的鱼水情深,也唱出了普通群众的民心所向。

我本以为全书肯定会不惜重墨去描写太阳,并刻意去表达红日的寓意。然而,全书一共十多处写到太阳,但只是一笔带过,只是写了一个太阳的寓言,一个将太阳还原为平凡群众的历史观。这与将历史归结于英雄的个人崇拜完全背道而驰。“红日”在书中被解读为平凡,而“红太阳”在“文革”中却被延伸为神话。这也为吴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屡被冲击埋下了命运的伏笔。在吴强的小说里,“红日”并非个人崇拜式的政治图解,而仅仅是一种抒情性的普普通通的景色描写。

小说写我军撤退时,片片白云在高空默默飘行,银色的太阳隐约在白云的背后,光秃的树梢在飒飒的寒风里摆动身姿,鸟鹊几乎绝迹了;写吐丝口战斗时的惨白阳光,斜照着石圩墙上,圩墙的石缝里,不断地挤出一条一条水柱,眼泪一样地往下流淌。整个小说共有十多处涉及太阳的描写,而这些描写仅仅作为一种景色衬托,甚至大部分全都带有一种阴暗与悲伤。

如果说“红日”在吴强的笔下也是政治抒情的话,那么他肯定抒发的是对平凡战士和普通群众的深情赞美。因此,没有将粟裕描写成英雄,更没有将他美化成神灵,而是将这位被誉为常胜将军的粟裕还原为平凡人,这便是吴强在《红日》里故意将粟裕进行“淡化处理”的原因。

吴强(1910-1990)这位江苏涟水人,对张灵甫攻占自己的家乡,肯定有着切肤之痛;这位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参加过莱芜、淮海等著名战役的军旅作家,对于这段历史的描写肯定有着他自己的独特感受。正是由于吴强对群众历史观的不懈坚持,正是由于他对个人崇拜的英雄历史观的大胆否定,也就导致了吴强后来多次遭到批判,被戴上“自然主义”等许多政治帽子,《红日》因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有人批判他“通过大量非战争生活场景的描写,削弱了这场战争的伟大”;有人批判他“写好人身上有毛病,坏人身上有亮点”,美化敌人,丑化我军;还有人批判他“肆意攻击伟大神圣的红太阳”。其实,这些批判他的“罪行”,正是吴强表现现代战争中的平凡个性和普通场景的主要艺术成就所在。吴强失去了光耀的职务和身份,被下放到奉贤农场担水浇菜,去印刷厂糊信封,到外轮码头当装卸工,然后又隔离审查、投入监狱长达10年之久,一直到1978年才平反昭雪,得以安心地离开人世。

我觉得正是这种所谓的“自然主义”,才使得吴强的《红日》能够名留青史。这种将历史还原成平凡的群众历史观,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标志了我们民族性格一种成熟,也正是这场战争给我们的民族在精神上带来的一个历史性进步。